

日本與聯合國

張棟材

壹

日本係於一九五六年十二月聯合國第十一屆大會時獲准為聯合國的第八十個會員國，距一九三三年三月間，日本因發動侵華之「九一八事變」遭受責難而悍然退出當年的國際聯盟，算來日本脫離國際社會已有廿三年之久。日本派駐聯合國之首任代表加瀨俊一在其「決定日本外交的瞬間」一書中，曾對此加以描述稱：「在退出國際聯盟時曾任全權代表的現參院議員佐藤尚武，也和重光外相一同出席了這次加入聯合國典禮大會，當他看到日章旗又重新飄揚在世界和平機構，似乎是感慨無量地已不覺老淚縱橫。」

從一九三三年初日本退出國際聯盟，到一九五六年末加入聯合國，這一段期間歷經對外戰爭、失敗投降、被佔領管制、獨立復興等種種變化，就日本外交論，則是受教訓考驗的反省期。例如前外相岡崎勝男即會稱：「自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便幾乎已經沒有真正的外交存在。所謂外交也有真正的存在。所謂外交也走協議，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而已。在第二次大戰中，也談不上有什麼外交，勉強道來，那就是努力過限

蘇俄維持中立關係以求保持北方安全，以及如何處理跟亞洲諸國間的關係等事。不過現在仔細檢討：在對蘇俄的判斷上雖然是太大意，諸如自德進攻莫斯科後，軍方對俄之露骨態度已使俄對我有所圖謀，且我對共產國家一向即在企圖消滅自由國家之基本危險性，尤病在認識不足。」另一日本職業外交家原駐土耳其大使上村伸一亦會稱：「自九一八事變起以迄戰後日本終止被佔領為止，日本在此期間沒有真正的外交。直至戰爭結束為止的外交，僅僅是為軍部打圓場，儘可能地但求稍微能收遏制軍部蠻幹的效果。沒有比那個時期更熱望於國民支持的了，但也只有慨嘆國民所表現的淡漠。在彈壓言論的情形下，我們根本無從向國民訴說苦衷。」

以上由岡崎、上村兩人對日本外交所作的自我批判，在日本國內各界亦均寄以同感，認其為沉痛而公允的責難。同時，這項自我批判也向國際間提供了使外人如何對日本重加評價的最佳註釋，從時間上將戰前與戰後做為辨別舊的和新的日本的一個界限，兩種迥然不同的日本面貌，通過外交作風表現，令人得出下列兩種觀感：

一、戰前的日本——在一心一意地仿效着西方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堅甲利兵政策，結果造成了軍部的猙獰暴戾，日本外交雖屬被動的幫兇地位，但亦染有迷信強權的狂妄性格，故終未能挽救日本一度覆亡的命運。

二、戰後的日本——圖以和平主義拭滌受人憎惡的武力擴張印象，和平外交育成了新生日本的繁榮。在既得的廉價安樂享受中，却又不免逐漸有了藉追求幻想型和平安套取自私投機成果的倖致心理傾向，但尙能隨時保持理智的調整。

貳

戰後日本外交的再出發，是以一九五一年九月簽訂舊金山對日和約為起點的。日本在對日和約上已首先表明了它要加入聯合國的願望，故在翌年四月該和約生效後，便立即於六月間辦理了申請加入手續。戰後日本外交猶如一個痛改前非的人要積極有所表現一樣，此種心情亦會由前首相吉田茂在舊金山對日和會的演說中充分反映出來，當時吉田稱：「今天的日本已不是昨天的日本，願獻身於和平民主與自由理想的日本，決不會辜負衆望。」從戰敗廢墟中立起來的日本，將和平視為最崇高的目標，它接受了制定放棄戰爭

與不保持軍備的所謂「和平憲法」，對於以維持世界和平為主要任務的聯合國，便自然地認為這正是它要在這方面有所表現的好場所，它之急於加入聯合國真是到了如飢如渴的程度。

在一九五六年末日本正式進入聯合國之前，日本的此種心情，曾受盡蘇俄故意刁難的折磨。蘇俄之對日本，始終是不會忘記作適時的襲擊：如第二次大戰末期，日尙妄求由俄出面調停，却未料突遭俄對日不宣而戰之背信行為，以致領土為俄侵佔；在舊金山和會中，蘇俄亦曾力謀破壞未遂；這都是使日本時感隱隱作痛的傷痕。其在阻撓日本以獨立國家地位進入聯合國的手段，蘇俄對日本自尊心的摧殘更使日本受到精神上的鉅創，影響所及則為內部治安的疾患叢生——這就是蘇俄於無形中藉此為日本左傾勢力助長了陣勢，為它們編製了一套理論依據來從基層打擊日本政府，一直到今天逐漸成為日本立國的最大威脅。

關於蘇俄阻撓日本進入聯合國的經過，可列舉下述諸點來說明其造成的日本內紛：

一、一九五二年九月當聯合國安理會審議日本第一次申請時的表決結果：贊成者十票，反對者一票，蘇俄以否決權將日本推拒門外。蘇俄所持的反對理由是：①舊金山和約對防止日本再成為侵略國一事，毫無保證；②日本在外國軍隊佔領下非為獨立國家；③日本與安理會之兩常任理事國（指俄濶共匪）尙在戰爭狀態中；④日本為侵略朝鮮之美軍基地，不能稱為愛好和平之國家。

蘇俄的此一說詞，亦即為日本左傾勢力推動反美、反政府的宣傳藍本，其後乃演繹為「日本在美國扶植下已復活了軍國主義」「日本是美帝國主義的僕從」等叫囂，使日本內部發生分裂與對立。

二、一九五三年第八屆聯合國大會中，蘇俄對日本入聯合國的發言，又有了新的藉口，它恫嚇日本如不與俄、匪簽訂和約，即不能打開進入聯合國的途徑。

蘇俄的此項詭策，勾引出了日本朝野的接近俄匪份子集團公然活動，不僅使甫告簽訂和約復交之中日關係被蒙上一層陰影，亦動搖了日本對自由世界的虔誠信念。

三、一九五五年第十屆聯合國大會中，蘇俄因深知中華民國必然反對僞

蒙進入聯合國，乃在阻撓日本的手法上改用了以牽引僞蒙並搭配東歐附庸國整批混入來作交換條件的陰謀，以期獵取得逞多方面之目的。

蘇俄此舉顯然在挑撥日本遷怒於中華民國；玩弄聯合國墮落為政治交易站；迫使日本在失望沮喪中向俄屈服。

最後，還是日本對蘇俄的折磨不得不低頭，日俄復交便是這樣催生出來的。在日俄復交的雙方交涉中，支持日本進入聯合國是交涉的一個大項目，蘇俄對日本所提出的「無條件地予以支持」(Undertakes to support unconditionally) 的討價，也仍不忘記蓄吝地還價為「將予支持」(Shall Support)。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九日，日本和蘇俄簽訂了復交的共同宣言，因而即在該年十二月十八日乃得以進入聯合國。

本來日本早已應在一九五二年秋進入聯合國的，却因為受到蘇俄從中阻撓，焦急地等待了四年多的歲月。

叁

一九五七年初，岸信介出任日本首相，時正當日本遂其進入聯合國初願不久，從這時起，日本便開始標榜它的外交三大基本政策為：①與自由國家保持協調；②聯合國中心主義；③堅持身為亞洲一份子之立場。

十年來，日本對聯合國的尊重與擁護，確已在實踐中表現了最大的誠意。日本對和平的呼籲，幾已成爲它在聯合國外交上的一個特徵，現任外相椎名即曾在聯合國大會的一篇演說辭內用了十二次的「真正的和平」語句。日本是受過原子彈災害的唯一國家，它對於停止核試問題也主張最力，活動最多。如在初入會的第十一屆聯大中，它就聯合加拿大、挪威提出了「核試事前登記制」；在第十二屆大會中更在西方國家與蘇俄的兩種提案之間單獨地提出了「核試暫時停止」案；其後，在反對法國核試、禁止使用核武器宣言、停止核試等決議案中，日本全是共同提案者與投贊成票者；對局部禁試條約的支持，以及對防止核擴散、裁軍等的大聲疾呼，日本在聯合國充分發揮了它的發言力，唯一受原子彈災害國家的這一項標誌，似乎使日本自感特別理直氣壯，受到全世界的注視。

在國際紛爭事件上，日本刻意在求以其本身所具之地域及無軍備等條件來代表穩健的亞非國家，盡到壓抑急進的過激傾向以與西方國家取得協調的

任務。日本喜於強調它是這兩者的「中間橋樑」。至於被視為奇蹟的日本高度經濟成長，因在事實上已使日本列身於先進國家之林，日本在聯合國並聲明過它要負起向低度開發國家作經技援助的責任，且以儘可能實行聯合國貿易開發會議所規定支付國民所得的百分之一的援助額為努力目標，這當然會更有助於日本以「中間橋樑」自居的信譽。日本已兩度當選為聯合國安理會的非常任理事國和經社理事會的理事國，這可以象徵日本的國際聲望與地位正在不斷增長。

但在另一面，日本也正遭到極大的困惑，蓋所謂「中間橋樑」畢竟是日的主觀願望，客觀形勢常使日本處於雙方夾縫中的窘境，為雙方所歧視。日本經常受到亞非國家的抨擊是指其追隨美國、消極、利己主義；西方國家則認為日本對聯合國的合作如派兵問題即不能應命，無異徒託空言。這些都擊中了日本的痛處，難作辯解。

這是最近的一個實例，日本自承為此陷於矛盾：去年聯合國特別政治委員會會舉行亞非四十七國共同提出譴責南非決議案的分別投票，日本雖亦正式表明了反對種族隔離政策的態度，但因顧慮到每年與南非的三億美元貿易額關係，便只有對有關經濟制裁項的投票予以棄權。

肆

關於日本能否派遣其自衛隊參加維持和平的聯合國軍一事，是多年來日本對聯合國外交最感苦惱的難題。當一九五八年黎巴嫩問題發生時，聯合國會要求日本參加聯合國監察團。日本國內因此引起海外派兵為合憲抑違憲的大論戰，結果是日本政府拒絕應命派兵。當時的日本常駐聯合國代表松平大使即曾向新聞記者發表他的看法說：「日本之不派兵是在與聯合國合作上說不過去的，派兵為對聯合國合作之基本任務。最低限度亦應以觀察員資格參加聯合國警察軍，否則即無從強化聯合國外交。」松平的此一論調會受到日本在野黨社會黨的大肆攻擊，以至日本政府不得不被迫對松平予以警告處分，並將常駐聯合國代表易為現任之松井大使。

照日本內閣法制局的解釋看，則是：「參加和平的警察行為，不能一概稱之為違憲。」這項解釋在去年九月間又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日本政府於去年因鑒於聯合國可能再度要求日本參加處理印巴戰爭之聯合國監察團；以

及日本可能當選為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而必須加強對聯合國合作關係，乃命法制局對自衛隊能否應命參加聯合國活動問題再加研究，這一次的解釋較以往已有顯著之不同：

第一：原則上已承認派遣自衛隊參加聯合國軍為合憲，只是指明在派遣時須視臨時情形而作之政治判斷為定。

第二：對聯合國軍劃出區分範圍，規定派遣自衛隊參加基於聯合國憲章第四十三條而成立者，在法理上與日本憲法第九條不相抵觸。

日本內閣法制局的這項新解釋，實具有深遠的意義在，它使日本修憲僵局覺得一個憑藉，可用更具彈性的解釋，在強化聯合國和平機能的照明下達成修憲之實。同時，也為其自身的安全保障計，有藉此為再加厚一層保障鋪路的考慮。按日美安保條約第十條的前段會明定日美兩國認為聯合國可保障日本之安全時，該條約即可失效，這已是早佈下的一着棋子。

日本對成立聯合國常備軍的構想，抱有甚大期望，這自然是由於上述日本之特殊情形而起，所以椎名外相在其若干次出席聯大的演說中，也都提到這一點。曩於黑魯曉夫突然提出組設聯合國永久和平軍的建議時，日本亦會頗表興奮，不過，日本在聯合國公開評其為不切合實際之論；表示贊成加拿大、北歐諸國所提組設聯合國待機部隊的方案，而且認為這是走向世界全面裁軍的必經過程。

日本在寄望於聯合國的安全保障上，常有乞靈於聯合國的過火做法。它所常用的和平論調，亦已受到「流於抽象論」的譏評。美「外交季刊」會對日本有過嚴正的指責：「日本對自身的防衛責任都漫不經心，却只希望取得和平與安全的成果。」

伍

日本所強調的聯合國中心外交，在今年有一個改革性的前進動向。日本政府在其檢討其聯合國中心外交時亦會痛感它未能名符其實地實施聯合國的決定是莫大遺憾，為了要改正這項缺點，正謀制定包括了派遣自衛隊員至海外的「協力聯合國法案，作為推動聯合國中心外交的主要動力源。

這一個法案含有日本執政黨與在野黨基本對立的最具爆炸性問題，將來如何通過國會立法的難關，自必有一番劇鬥。但日本政府敢於提出此一問題

向在野黨挑戰，這種勇氣已預示出日本的聯合國中心外交的求變要求。

日本外交確有爲人所詬病的「兩面外交」而惟利是圖的作風，不過，就佐藤內閣繼承聯合國中心外交的表現上看，比起由岸至池田內閣時期要積極務實得多。其實質的反共精神並不退縮，例如在聯合國斥責共匪試爆，它對亞非國家的影響力是不容漠視的；在所謂「中國代表權」問題上所持堅決拒匪的立場，亦充分盡到維護正義的任務。且日本政府會爲此一問題特派其常駐聯合國代表松井大使於一九五四年春歷訪非洲國家，以所得印象發爲支持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合法地位的報告，這在當時對戴高樂承認共匪後的國際間

對匪姑息趨勢，不啻是沉重有力的一擊。舉此一端，亦可見日本的聯合國中心外交確是慎重其事，沒有只圖運用外交技巧譁衆取寵的欺詐成分。

日本的未來發生變化的危機，係來自內部左傾勢力和國際赤色帝國主義的結合。日本會向聯合國提出一項建議，請求聯合國派遣和平監察官至各地區設常駐機構，以防止或制止地域性紛爭，由此點可以覺察出日本今天正試圖以聯合國中心外交來抵制該項危機產生的用心。日本政府擬訂中的「協力聯合國法案」，可說是爲此用心正在進行一項民意探測。

日本戰後民主改革與農村家族制度

孔祥銘

一 傳統家族制度之機能

戰後的農地改革對農業經濟的影響很大，此一變革對於日本傳統的家族制度，所受之衝擊，尤爲深遠，現擬就此點加以分析，以見日本農家的轉變及其政治行爲的傾向。

日本傳統的家族制度，可以說是與零細經營的小農制結合爲一體的，家族的成員是農業經營的基本勞力，他們共同耕作，以生以息，生產秩序與家族組織有密不可分之關聯，川島武宜教授認爲此種秩序之支配原理，可名曰「歸一原理」，即①家族成員沒有個人單獨的生活場所，其生活的每一部份都與共同體結合爲一；②家族成員相互之間，無論在生活、思想、感情或行爲上，均有共同的理解和認識；③家族成員不但自己與家族全體有一致的認識，而且他相信其餘的成員也和自己有同一的理解，因此他們的立場與感情是同一的；④更進一步分析，家族成員相互之間又不斷地期待而且要求同一

的思想和行動。(註一)

「歸一原理」所支配下的家族是以家長爲中心。家長爲家族之總領，其任務在督率家人共同生產，維持家計，而家計的維持須要保持祖先所傳下來的家業。在農業社會中，家業的經營主要以土地爲對象，故土地成爲家族制度最重要的物質基礎，所謂「家督田」意指吃飯田，爲一家生活之所賴，在昔日封建時代，武士的俸祿，商家的招牌均爲祖孫相傳的家產，而土地亦如之。家業的經營需要維持勞動的紀律與家族的團結，于是而有先祖的祭祀。祭祀是後代子孫與祖靈之精神交通，故祭祖必須出于至誠，而且還是屬于正統家人的義務與權利，祖先創業之精神成爲後代子孫之規範，歷代相沿，蔚爲風氣，故又稱「家風」、「家名」，亦即家族之象徵。上述家產、家督、家業、祖風，即成爲家族的構成要素。

當德川幕府中期以後，人口增加，耕地不足，故在長子單獨繼承下的農業社會中，次男三男既無法定繼承權，農忙時固然可以增加生產，共同耕作